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23.02.011

· 新媒体研究 ·

新闻研究中的隐喻： 一个理论化的视角

白红义^{1,2}

(1.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隐喻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理解外在世界的认识工具, 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化工作的关键环节。新闻研究生成和使用了大量隐喻, 但它如何在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发挥作用仍较少得到讨论。新闻研究要么将来自新闻业本体的隐喻作为描述工具, 在理论转化上有所忽略; 要么大力引进来自其他学科业已完成理论转化的隐喻, 对新闻业本身的观照有所不足。随着新闻研究对理论性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 研究者需有意识地从理论化工作的角度认识和理解隐喻, 不止于引进已有的隐喻, 还要探索构造新隐喻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 新闻研究; 隐喻; 经典新闻学; 数字新闻业; 学科流动

中图分类号: G2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23)02-0108-11

一、引言

隐喻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修辞现象, 但其作用绝不仅仅停留在修辞维度, 它还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新生与抽象的事物。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 隐喻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 渗透在我们的语言、思想和行动中, 影响我们如何思考、言说乃至生存。^①20世纪初, 学者们开始探索有关隐喻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 美国哲学家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对此作出了较大贡献, 此后哲学、文学批评领域对隐喻的用法讨论较多。^②隐喻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学者们常用隐喻来解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将已知的、熟悉的现实投射于复杂的、费解的事物, 促进对它的理解。隐喻具有很强的启发或暗示作用, 有助于理论化工作的开展。

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很多经典的隐喻, 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铁笼”、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生态”、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剧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等, 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很多隐喻

收稿日期: 2023-0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闻社会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20FXWB007)。

作者简介: 白红义, 男,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社会学、数字新闻学、政治传播。

^① [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1页。

^② Richard Swedberg, “Using Metaphors in Sociology: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51, No. 2, 2020, pp. 240-257.

似乎成为不言自明的概念，研究者们已经忘记了它们最初是作为隐喻被使用的，例如“集体记忆”这样的隐喻就被学者们认为表达了具体的现实。^①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未能例外，仅对新闻建构过程的研究就出现过多个隐喻，比如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把记者进行新闻采集的空间设置模式称之为新闻网（news net）^②，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说新闻生产是一个流水线作业的过程^③，查尔斯·班茨（Charles Bantz）等人把新闻机构形容为一个新闻工厂（news factory）^④等，都是经典新闻学里研究者针对新闻生产过程使用的隐喻。到了数字媒体时代，隐喻依然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新闻业的重要工具，回音室^⑤、平台^⑥、信息疫情^⑦等大量新的隐喻进入数字新闻研究的视野。

新闻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隐喻的使用方式：第一种是新闻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基于对研究对象本体和其他领域的喻体的观察而自主建构的，诸如新闻工厂、新闻网、流水线作业，经典新闻学中的隐喻大多属于这种类型。而随着新闻研究对理论的重视，第二种方式开始占据新闻学隐喻的主流，即借鉴其他学科业已经过从隐喻到理论转化的概念性隐喻，更看重其在推进理论化方面的作用，例如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把关人”、城市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文化社会学的“场域”、科学技术研究的“行动者网络”以及科学社会学的“边界工作”等。

隐喻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化的重要策略，在社会学、组织理论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重视。新闻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存在大量的隐喻，但相对于社会学等学科，新闻学科尚未对隐喻的角色、功能乃至可能带来的陷阱进行充分的讨论，尤其是它对于研究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意义。在新闻研究日益重视理论化的当下，隐喻这一重要的理论化工具应得到更多的重视。笔者拟借鉴社会学、组织研究等领域对隐喻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梳理既有研究对隐喻的使用状况，从类型、来源等方面呈现新闻研究者是如何使用隐喻的；另一方面，在上述耙梳的基础上，从理论化的角度探讨隐喻在新闻研究中的功能和作用。

二、作为描述工具的隐喻

新闻研究以往对隐喻的关注通常集中于新闻文本如何使用特定的隐喻对某些新闻事件或某类新闻现象进行架构，如媒体在非典纪念报道中普遍使用的“战争”隐喻^⑧、疾病报道中的“军事”隐喻^⑨等。这些研究分析的隐喻多来自日常生活，隐喻在这里起到认知图式的作用，媒体只

① Dalia Gavriely-Nuri, "Collective Memory as a Metaphor: The Case of Speeches by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2001 - 2009," *Memory Studies*, Vol. 7, No. 1, 2014, pp. 46-60.

② [美]盖伊·塔克曼：《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③ [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④ Charles R. Bantz, Suzanne McCorkle, Roberta C. Baade, "The News Fac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7, No. 1, 1980, pp. 45-68.

⑤ Stefan Geiß, Melanie Magin, Pascal Jürgens, Birgit Stark, "Loopholes in the Echo Chambers: How the Echo Chamber Metaphor Oversimplifies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Gateways on Opinion Expression," *Digital Journalism*, Vol. 9, No. 5, 2021, pp. 660-686.

⑥ 刘战伟：《凸显什么？遮蔽什么？——作为隐喻的“平台”：连接、中介与基础设施》，《新闻记者》2022年第6期，第54-66页。

⑦ Felix M. Simon, Chico Q. Camargo, "Autopsy of a Metaphor: The Origins, Use and Blind Spots of the 'infodemic'," *New Media & Society*, 2021, DOI: 10.1177/14614448211031908.

⑧ 李红涛：《已结束的“战争”走不出的“迷宫”——“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84-93页。

⑨ Zheng Yang, "Military Metapho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ease Coverage: A Case Study of the People's Daily, 1946 - 2019,"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4, No. 3, 2021, pp. 259-277.

是以特定的隐喻来理解新闻事实。这类研究不是笔者所要讨论的对象,而是将重点关注那些运用隐喻来帮助理解新闻和新闻业的研究。

事实上,过往的新闻研究曾使用了大量隐喻来帮助学者们理解新闻业,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就以12个隐喻来开启她对新闻业的讨论,包括新闻业是第六感、新闻业是一个容器、新闻业是一个故事、新闻业是一个孩子等^①。塔克曼的经典著作《做新闻》中也充斥着大量的隐喻。在该书正文伊始,塔克曼便以窗口作喻,“新闻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其窗框,美国人得以了解自己与他人,了解自己的机构、领袖和生活方式,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情形”“透过窗口看到的景致取决于窗子的大小、窗格的多寡、玻璃的透明度,窗口正对的是街道还是后院”。^②上述隐喻都是作为一种描述工具在使用,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来比喻新闻和新闻业以加深认识。此类型的隐喻集中在对新闻业本体的描述上,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对新闻生产过程的隐喻式描述

在分析新闻媒体的新闻采集能力时,塔克曼使用两个隐喻对新闻空间进行了区分,一个是新闻网(news net),一个是新闻毯(news blanket)。“无论是毯还是网,都能够捕捉到新鲜的信息”,然而,新闻毯更为细密,不分大鱼小鱼统统捕捞进来;新闻网则为捕捉重要事件或人物而铺设,也就是更看重“大鱼”,“其捕获能力取决于网格的密度和网线的拉伸强度”。^③新闻媒体借助新闻网的设置,使新闻生产所需的原料得到稳定的供应,保障了新闻工作的顺利开展。新闻网的主体由记者各自负责的条线(beat)构成,这是一套新闻机构关于记者搜集新闻信息的组织原则,“媒体组织试图通过报道领域之间的主题划分或地域划分来对它们所报道的社会环境进行结构化处理”^④。“条线”一词原本用以形容负责一个街区的警察巡逻的固定路线,进入新闻业后就不再局限于指地理空间,而转向了大多数记者在职业生活中能够涉及的东西。^⑤早在利昂·西加尔(Leon Sigal)对消息来源的经典研究中就讨论了新闻编辑室与条线的关系,华盛顿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政治记者搜集新闻最重要的地点,他们的条线通常是一两个政府机构。记者和编辑通过在这些巡航区域中的对谈(shop talk)来交换对于人物、事件甚至什么是新闻的看法。^⑥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则对条线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条线,一类是由特定话题构成的条线,另一类是由物理地点构成的条线。条线报道的独特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条线在新闻组织中的历史要比从事条线报道的个体的历史更长久;第二,记者的条线由上级分派而来,他们负责报道条线,但并不拥有条线;第三,条线是由发生在新闻编辑室之外的一系列活动构成的复杂的报道对象;第四,条线是记者所属的社会环境。^⑦

负责各个条线的记者与他们接触的消息来源结成了密切关系。甘斯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喻成跳一场探戈舞,虽然两者均可随时带领另一方起舞,但大部分时间占上风者仍为消息来源。^⑧20多年后,兹维·莱奇(Zvi Reich)进一步讨论了这一舞蹈隐喻,他提出的新闻启动过程模型区

① Barbie Zelizer, *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p. 11-19.

②③ [美]盖伊·塔克曼:《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28页。

④ Peter Maurer, Melanie Magin, “Beat Journalism and Reporting,”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013.905.

⑤ Murray Dick, “The Re-birth of the ‘beat’,” *Journalism Practice*, Vol. 6, No. 5-6, 2012, pp. 754-765.

⑥ Leon V.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 1973, pp. 37-49.

⑦ Mark Fishman,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p. 28-30.

⑧ [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分了两个阶段的舞蹈，记者和消息来源都有领舞的机会。^① 新闻网的铺设大大扩展了新闻媒体采集新闻的范围，与消息来源的互动进一步保障了新闻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了产制新闻的效率。对于那些“因时而作”的新闻组织来说，效率是日常新闻生产过程优先考虑的问题。在甘斯的笔下，效率对于新闻组织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绞尽脑汁提高效率，试图像工厂那样采用流水线作业的方式进行新闻生产。“新闻机构实践的是环环相扣的新闻生产（*seriatim journalism*），因为每一则新闻故事在到达受众之前都要经过好几位新闻从业者之手。有鉴于此，某些新闻记者把他们的机构描绘成生产流水线；正如一位执行制片人所说，‘每天的常规工作就像是将螺母拧到螺栓上’。”但甘斯认为，“这个与工厂之间的类比不是完全准确，因为与汽车相比，新闻是一种更加多样化的产品；但是就像汽车一样，新闻节目或杂志也同样是由很多部分组装起来的”。^②

（二）对新闻组织形态的隐喻式描述

甘斯书中流水线和工厂的比喻在班茨等人的研究里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他们把新闻机构形容为一个新闻工厂。新闻产品的生产要经过五道流水线：故事构思、任务分配、材料的收集和组织、材料的组装、新闻演播的呈现。在此过程中，组织内顾问的影响、制片人的监督、产品形态的特点、机构规模等因素也在影响新闻生产“流水线”方式的形成。这种高度常规化的处理方式不仅缺乏灵活性，也让新闻工作者难以实现自身的职业期待。^③ 关于新闻组织的理解也不止于“工厂”这一种隐喻。台湾学者张文强把媒介组织形容为一种“封建采邑”，从权力视角切入揭示了“科层制”与“父权”混杂的台湾媒介组织。^④ 记者自己则把新闻编辑室视为一个“战场”，他们把新闻工作看作是一场战争，新闻编辑室是战争的基础。首先，新闻编辑室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制作高度相关和高质量内容的艰难日常任务的战场。其次，它是普通新闻工作者和该组织高管或经理之间的斗争场所。此外，从广义的社会意义上来说，新闻编辑室也是界定社会“现实”的重要斗争场所，不同的社会力量在这一领域对抗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现实”和“意义”。^⑤ 在新闻编辑室这一战场上，新闻记者就像在时间机器里工作，需要在每天新闻生产的战斗中击败时间这头野兽。^⑥ 新闻生产中的时间充分体现在对各种“死线”（*dead line*）的靠近中，这个形容截稿期限的隐喻最初的意义来自美国内战时期，监狱在距营地围栏约5.2米的地方为囚犯设置了界线，试图越线的囚犯将被卫兵射杀。^⑦ 不同形态的媒体有各自的截稿时间，但到了数字时代，所有媒体却开始共享同一个截稿时间，即“此时此刻”，记者的工作变得仓鼠化（*hamsterization*）^⑧，被迫卷入“新闻飓风”（*news cyclone*）之中与时间赛跑。^⑨

① Zvi Reich, "The Process Model of News Initiative: Sources Lead first, Reporters thereafter," *Journalism Studies*, Vol. 7, No. 4, 2006, pp. 497-514.

② [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③ Charles R. Bantz, Suzanne McCorkle, Roberta C. Baade, "The News Fac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7, No. 1, 1980, pp. 45-68.

④ 张文强：《媒介组织内部权力运作与新闻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内的权力控制与反抗》，《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3期，第29-61页。

⑤ Akhteruz Zaman, "Newsroom as Battleground: Journalists' Description of Their Workspaces,"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4, No. 6, 2013, pp. 819-834.

⑥ Philip Schlesinger,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London: Constable, 1978, p. 83.

⑦ Lene Rimestad, "Focusing on Deadlines: How Orientation to Time is a Constitutive Normative Constraint at Meetings in Media Organizations," *Time & Society*, Vol. 24, No. 2, 2015, pp. 183-200.

⑧ Nikki Usher, "Breaking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US Metropolitan Newspapers: Immediacy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Vol. 19, No. 1, 2018, pp. 21-36.

⑨ Eric Klinenberg, "Convergence: News production in a Digital A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97, No. 1, 2005, pp. 48-64.

(三) 对新闻业功能和角色的隐喻式描述

前两种隐喻主要出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之中,将隐藏在新闻文本之后的后台过程用一种比喻的形式揭示出来。实际上,新闻研究中的隐喻远不止于此,在关于新闻业的功能和角色的话语中也是隐喻广泛使用的地方,如观点的自由市场、看门狗、第四等级、扒粪人等。^①美国报纸也惯常使用隐喻来为报纸命名,如先驱、纪事、哨兵等,借此描述报纸的任务。^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用“扒粪者”一词来称呼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调查记者,认为调查记者是对政客、企业主等邪恶之人与事采取不留情面的揭露者与对抗者。^③“扒粪者”原是负面词汇,记者们却甘之如饴,此后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也乐于以揭发扒粪的“看门狗”自居。蒂姆·沃斯(Tim Vos)的一项研究专门讨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报纸借用镜子(mirror)这一隐喻来描述客观性作为规范或实践如何体现在报纸工作之中,“如果不考虑镜子隐喻,客观性作为职业规范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④。在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墙”(wall)同样是一个隐喻,它在两种业务之间形成了一道隔阂,意在强调新闻生产的自主性,然而在数字新闻时代这道防火墙已经变成了一道窗帘。^⑤随着新闻业危机的加深,美国大量的地方性报纸纷纷关闭,学者们开始用新闻荒漠(news desert)来形容这些报纸所在的城镇和地区,因为那里以后将很少能接收到地方新闻。居民难以获得所在地方的新闻,而这将会影响他们参与投票等公共事务。^⑥

无论是新闻生产过程、新闻组织形态,还是新闻业的角色和功能,隐喻都是一种描述工具。研究者虽然使用了这些隐喻,但并不是最早发现或命名它们的人,它们往往出自新闻从业者之口,因为记者本身便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使用隐喻的主体。一项对记者日常语言的研究发现,他们在阐述新闻工作时频繁使用隐喻。研究者从中概括出五种最常使用的“概念性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s),即分别把新闻工作视为选择、建构、竞赛、交易和权力游戏。因而,在记者的日常工作中,也存在他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journalists live by)。^⑦在另一项关于新闻编辑室的研究中,记者使用很多与战争有关的隐喻来描述他们对这一工作场所的理解,把新闻室比喻为战场显示了记者对编辑部内混乱一面的描述。研究者指出:“这种与战争有关的隐喻在概念上与记者对自己的其他宏大想法相差无几,比如真相追寻者、现实的无私观察者,正义的讨伐者或扒粪人。它将新闻工作与社会强者的行动联系在一起。”^⑧由此来看,记者在新闻工作中对隐喻的使用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并无太大区别。

^① Martin Conboy, Minyao Tang, “Core Blighty? How Journalists Define Themselves Through Metaphor,”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7, No. 7, 2016, pp. 881-892.

^② Tim P. Vos, “‘A Mirror of the Times’: A history of the Mirror Metaphor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2, No. 5, 2011, pp. 575-589.

^③ 林照真:《调查新闻学 V. S. 公共新闻学:两个“公共领域”新闻理想型的对话与交融》,《台大新闻论坛》2007年第6期,第101-130页。

^④ Tim P. Vos, “‘A Mirror of the Times’: A history of the Mirror Metaphor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2, No. 5, 2011, pp. 575-589.

^⑤ Mark Coddington, “The Wall Becomes a Curtain: Revisiting Journalism’s News - business Boundary,” In Matt Carlson, Seth C. Lewis (Eds.),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67-82.

^⑥ Patrick Ferrucci, Kathleen I. Alaimo, “Escaping the News Desert: Nonprofit News and Open-system Journalism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Vol. 21, No. 4, 2020, pp. 489-506.

^⑦ Gitte Gravenaar, “The Metaphors Journalists Live by: Journalists’ Conceptualisation of Newswork,” *Journalism*, 13 (8), 2011, pp. 1064-1082.

^⑧ Akhteruz Zaman, “Newsroom as Battleground: Journalists’ Description of Their Workspaces,”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4, No. 6, 2013, pp. 819-834.

当隐喻作为一种描述工具时，它更多发挥的是认知功能，帮助新闻从业者理解他们试图描述的现象。记者们使用的隐喻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即经由记者的话语来分析这一职业群体的专业认同、意识、文化等问题，隐喻本身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就研究的理论化而言，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虽由记者们率先提出，却真正地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具有概念工具特征的隐喻。这类隐喻为研究者对要研究的经验现象进行命名并形成中心概念提供了便利，有利于他们通过概述现象的结构、模式和组织来充实隐喻的内涵，使之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不过，新闻研究还较少这样使用针对新闻业本体的隐喻，虽然它们发挥了隐喻的启发作用，但仅限于此，在理论化方面更多的是借用别的学科已经成熟的隐喻。

三、作为理论工具的隐喻

除了重视新闻记者们制造和使用的隐喻外，学者们还广泛使用了很多已经完成理论转换的隐喻。与前一种隐喻主要出自新闻业本身不同，作为理论概念的隐喻基本上已经经过了理论转换，也就是说它们成为隐喻的过程在别的学科已经完成，因而可被新闻研究者直接援引使用。事实上，新闻研究使用这一类型隐喻的历史不算短暂。早在1950年，大卫·怀特（David White）就从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社会心理学引入“把关人”隐喻讨论新闻选择的过程。把关人是由一系列隐喻构成的隐喻网络，包括关卡、渠道、场域等，这或许是最早出现在新闻研究中的一个隐喻性概念并沿用至今。^①怀特引入的这个隐喻是最容易创造出的一类隐喻，通过对某类现象的命名让人轻松记住和掌握。因此，隐喻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帮助我们描述那些尚未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事物。它们也许在形成理论时，即当我们想要表达那些尚未被整理或语言化的想法或洞察时，特别有用”^②。在诸多隐喻中，那些“关键隐喻”尤为值得重视，它们指引我们的思考方式，为之提供视角、关系、方向、特征、原则。^③以下将以两类“关键隐喻”为例，讨论这类隐喻如何运作。

（一）关于空间的隐喻

在最近几年的新闻研究中，场域、生态和生态系统等概念正成为形容数字媒体环境的隐喻。这些概念最初来自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社会学将其作为空间隐喻引入，使其在塑造和形成与空间有关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新闻学则直接从社会学科借用这些概念，以便更好地应对新闻业剧变后带来的分析层次和方法论上的挑战。^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隐喻在理论使用上有着强弱之分：越是强隐喻越有可能成为更重要的理论路径，也会得到更为全面和系统的使用；反之，弱隐喻则使用得不具有系统性，更易成为边缘性的理论角色。^⑤据此来看，场域、边界和网络都属于强隐喻，生态（生态系统）、世界和系统则是弱隐喻。

在这些空间隐喻中，场域和生态常被学者们放在一起比较。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

^① 白红义：《媒介社会学中的“把关”：一个经典理论的形成、演化与再造》，《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06-115页。

^② [美]帕梅拉·舒梅克、[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美]多米尼克·拉索萨：《如何构建社会科学理论》，乔飞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第173页。

^③ Andreas Liljegen, "Key Metaphors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Occupations as Hierarchies and Landscap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No. 11, 2012, pp. 88-112.

^④ Stephen Reese, "The New Geography of Journalism Research: Levels and Space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4, No. 7, 2016, pp. 816-826.

^⑤ Ilana Friedrich Silber, "Space, Fields, Boundaries: The Rise of Spatial Metaphor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Vol. 62, No. 2, 1995, pp. 323-355.

bott) 指出两个概念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隐喻的根源不同,他认为布尔迪厄场域概念的隐喻根源在于经济,而他的生态概念“将生物学上有机体之间在空间上的竞争和共存与来自法律和政治语言(管辖权、解决方案等)的策略概念混合在一起”,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隐喻世界比布尔迪厄的大得多,我不允许任何单一隐喻在我的思维中占据中心位置”^①。不过这一观点遭到了刘思达和穆斯塔法·埃米尔拜耳(Mustafa Emirbayer)的挑战,他们认为布尔迪厄事实上使用了大量来自不同词源的概念,最显著的是物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场域的隐喻来自物理科学,特别是经典电磁学;资本是个经济学概念,但布尔迪厄使用它的方式比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更宽泛;惯习和符号暴力则都来自人类学。^②比较而言,在新闻研究中场域理论获得了比生态理论更为广泛的应用,更具有强隐喻的色彩。而这类关键隐喻往往是由一系列概念组成的,例如场域理论内就包含场域、资本、惯习、幻象等多个概念。一项对1998—2018年间新闻研究使用场域理论情况的分析表明,22.6%的新闻场域研究论文单独使用了场域概念,是最为主流的方式,场域和资本结合使用次之,第三种常见方式是场域、资本和惯习的结合。^③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在发掘新的概念,以拓展场域理论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最近的一项研究就基于新加坡的新闻创业公司来讨论新闻场域中的“迟滞”(hysteresis)现象。^④场域理论的多个概念都被新闻研究者操作化应用在具体的研究中,而生态理论本身存在的竞争、同化等概念并未得到应用,更像是为新闻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⑤

(二) 关于技术的隐喻

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研究中充斥着大量隐喻,因为隐喻“有助于描述新奇的事物”^⑥,诸如信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之类的隐喻“不仅有助于使非专业人员理解科学技术,还可以指导科学工作”。^⑦在新闻业的运作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巨大变化,相关的隐喻同样成为突出现象。研究者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引入了众多已被理论化的隐喻概念。比如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在研究美国新闻业围绕机器人写作的争议时借用了“技术戏剧”(technological drama)的概念。^⑧技术人类学家布赖恩·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提出的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在新兴技术的社会界定过程中,存在着技术规制、技术调整和技术重组三个阶段,“戏剧”这个比喻强调的是由“影响区域”产生的竞争性宣称或者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其中交织着技术的陈述与反陈述话语。因此,“技术戏剧”是政治话语的一种特殊的技术形式。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技术话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隐蔽的价值观念,甚至存在着政治逻辑。^⑨普法芬伯格用“技术戏剧”这一概念描述技术陈述与反陈述的冲突,凸显的是这一过程

① [美]安德鲁·阿伯特:《生态与场域》,周忆粟译,未刊稿,2020年。

② Sida Liu, Mustafa Emirbayer, “Field and ec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4, No. 1, 2016, pp. 62–79.

③ Phoebe Maeres, Folker Hanusc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ow Journalism Scholarship Appropriates Bourdieusian Thought,” *Journalism*, Vol. 23, No. 4, 2022, pp. 736–754.

④ Matthew Chew, Edson C. Tandoc Jr., “Media Startups Are Behaving More like Tech Startups—Iterative, Multi-Skilled and Journalists That ‘Hustle’,”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DOI: 10.1080/21670811.2022.2040374.

⑤ 白红义、张恬:《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4期,第109–132页。

⑥ Sally Wyatt, “Metaphors in Critical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3, No. 2, 2021, pp. 406–416.

⑦ Sally Wyatt, “Danger! Metaphors at Work in Economics, Geophysiology, and the Interne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29, No. 2, 2004, pp. 242–261.

⑧ Matt Carlson, “The Robotic Reporter: Automated Journalis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 Compositional forms,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Digital Journalism*, Vol. 3, No. 3, 2015, pp. 416–431.

⑨ Bryan Pfaffenberger, “Technological drama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17, No. 3, 1992, pp. 282–312.

的表演性，其中涉及场景的生成、行动者的角色以及在观众面前实现特定的目的。^①

技术戏剧自然有着开始、高潮和落幕等不同阶段，在上演的过程中，不同角色相继登台，发挥着各自的特定作用。但在技术与新闻的互动中，更为普遍的现象可能是一种黑箱式的运作。黑箱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其1984年的经典著作《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提出的，他从控制论中引入这一隐喻来形容自然/科学物件。拉图尔借用这个来自系统论的概念描述那些“已经被承认被接受为真实、准确和有用的科学理论、科学事实和科学仪器”^②。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黑箱描述的是一种多个行为体被整合为封闭整体的状态，以增强网络的稳定性，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目的正是打开黑箱。学者们已经借助这一概念分析了新闻业中的内容管理系统、数据、算法等物件。进一步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之所以从处理技术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前新闻研究分析技术客体的一种主导路径，很大程度也与其是一套隐喻网络有关，行动者、网络、转译、强制通过点等隐喻共同构成了这一理论。

（三）隐喻的理论化使用

空间隐喻和技术隐喻都是学者们用来分析和阐释当前数字新闻业运行状态的理论工具。正如安东尼·纳德勒（Anthony Nadler）所说：“当新的模式或思想轨迹无法通过现有术语和话语概念雄辩地描述时，隐喻一再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③如果说日常语言中的隐喻更多是一种未加思考的使用方式，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则是更有意识地使用隐喻。研究者之所以热衷于使用隐喻，就在于它不再是简单的描述性概念，而是具有理论建构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它所具有的启发性（heuristic）。^④研究中使用隐喻会起到“议程设置”的功能，对理论与研究都产生形塑和控制作用，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象的一些维度，而淡化与理论无关的另一些维度。^⑤

当隐喻作为理论化的工具时，它首先扮演的是一种敏感性概念的角色。定义（definition）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极为有用，已经有大量竞争性理论来处理人们如何创造和界定分类和概念，隐喻理论也是其中的重要类型。^⑥就定义这一功能而言，隐喻比较接近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所说的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缺少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但却能够提供从何处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⑦，它可以“通过磨练研究者的感官来帮助其看到新的事物”。^⑧这与隐喻的本质十分吻合，它通常用来发现而非验证。^⑨新闻边界研究中使用的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就被认为是一个敏感性概念，目前已经成为新闻研究中分析新闻业内外冲击的主导性中层理论。边界更强调与其他领域的差异，因而需要对某种特定事物或是研究对象进行界限划定（demarcation）。在数字新闻时代，边界不再只是一条清楚界定的界线，还可能是一

① Stuart A. Selber, "Technological Dramas: A meta-discourse Heuristic for Critical literacy," *Computers & Composition*, Vol. 21, No. 2, 2004, pp. 171-196.

② 刘文旋：《从知识的建构到事实的建构——对布鲁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种考察》，《哲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8-125页。

③ Anthony Nadler, "Nature's Economy and News Ecology: Scrutinizing the News Ecosystem Metaphor,"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0, No. 6, 2019, pp. 823-839.

④ Richard Swedberg, "Using Metaphors in Sociology: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51, No. 2, 2020, pp. 240-257.

⑤ Ilana Friedrich Silber, "Space, Fields, Boundaries: The Rise of Spatial Metaphor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Vol. 62, No. 2, 1995, pp. 323-355.

⑥ Richard Swedberg, "On the Use of Definitions in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23, No. 3, 2020, pp. 431-445.

⑦ Herbert Blumer,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No. 1, 1954, pp. 3-10.

⑧⑨ Richard Swedberg, *The Art of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4, 92.

个密集而又不甚清晰的“边界区”。由此,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交易区域”(trading zone)和“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也进入新闻研究中,前者形容的是异质行动者开展互动的社会空间^①,后者则指不同行动者进行交流与合作的特定对象。^②新闻业可被视为一种多边界的“交易区域”,在不同的边界之间存在着“边界对象”,有学者就将代码共享与协作平台 GitHub 视为交易区,考察在该社会空间中行动者如何以“新闻”为边界对象开展复杂的实践活动。^③

隐喻还可以发挥类比(analogy)的功能。“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④隐喻总是涉及两个事物,一个是隐喻借用的来源,另一个是隐喻使用的目标,二者必然存在相似性或可类比的地方。从本质上说,隐喻总是用一个来引申另一个。例如新闻生态系统这一隐喻就“唤起了蓬勃发展的媒体系统与健康和肥沃的自然栖息地之间的联系”^⑤,对新闻系统应该如何运作提出了方向;而来源于生物学和园艺学的混杂性(hybridity)隐喻,也成为新闻研究用来描述不同形式的新闻文化、实践、边界等交融现象的流行概念。^⑥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曾阐述了三种可有效分析现象的技巧,即类比、隐喻和模式。^⑦在一定意义上,隐喻也可以归入类比之下,只不过因为它太过重要,才被斯威德伯格单独拿出来讨论。隐喻意味着用更熟悉和系统的知识去理解相对不熟悉的目标领域,选择不同的隐喻会凸显不同的理论意涵。以前述空间隐喻为例,本质上都是具有关系面向的理论,“比如边界处理的是区分关系,场域描绘的是支配关系,生态强调的是竞争关系,网络关心的是互动或联结关系”。^⑧它们之所以被引入新闻研究是因为数字新闻业出现的多元行动者令新闻业不再如往日稳定和固化。在一些数字新闻学的前沿领域,学者们已经明确将“关系”作为讨论的核心。例如在新闻平台研究中,有学者就用“协商空间”(spaces of negotiation)这一隐喻来透视平台公司与新闻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⑨

四、讨论与结语

在组织理论等领域,早期研究曾围绕隐喻是否应该存在于理论化过程中及其如何发挥作用有所争论,此后快速进入分析隐喻的特点及其应用的阶段,致力于讨论隐喻的不同运作模型。^⑩类似争论的出现恰恰表明这些领域的学者接受了隐喻作为理论工具的存在。一些大众传播理论在形

① Peter Galison, *Image and logic: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② Susan Leigh Star, James R.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9, No. 3, 1989, pp. 387-420.

③ Mario Haim, Rodrigo Zamith, "Open-Source Trading Zones and Boundary Objects: Examining GitHub as a Space for Collaborating on 'New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7, No. 4, 2019, pp. 80-91.

④ [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⑤ Anthony Nadler, "Nature's Economy and News Ecology: Scrutinizing the News Ecosystem Metaphor,"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0, No. 6, 2019, pp. 823-839.

⑥ Daniel C. Hallin, Claudia Mellado, Paolo Mancini, "The Concept of Hybridity in Journalism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28, No. 1, 2023, pp. 219-237.

⑦ Richard Swedberg, *The Art of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0.

⑧ 白红义、张恬:《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4期,第109-132页。

⑨ Thomas Poell, David B. Nieborg, Brooke Erin Duffy, "Spaces of Negotiation: Analyzing Platform Power in the News Industry,"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DOI: 10.1080/21670811.2022.2103011.

⑩ Joep P. Cornelissen, "Beyond Compare: Metaphor in Organization Theo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0, No. 4, 2005, pp. 751-764.

成时也广泛使用了隐喻的方法，如议程设置、知识沟、魔弹论等。因此，有传播学者特意强调隐喻对于理论建构的作用，诸如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将一个模糊的想法逐渐变成一个文字性的陈述；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想法或假设；有助于理论一致性；可以帮助我们记住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将一个理论可视化并更好地理解理论；甚至提供一种情绪冲动或兴奋。^①不过，类似的话题还较少出现在新闻学者们的讨论中。随着新闻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日益加强，探索各种有利的理论化工具已是需要提上日程的工作。例如新闻学科是否也可像社会学那样，借助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来发展理论。^②相对于上述路径，隐喻已是较为成熟的一种理论化工具。比如有学者就使用涂色（colouring）和锚定（anchoring）两个隐喻来分析记者在报道中如何处理质性内容和量化数据之间的关系。^③

在知晓隐喻在理论化工作具有的潜力后，关键在于如何构造隐喻。新闻研究中既有的理论性隐喻多从其他学科引进而来，已经提前完成了从隐喻到理论的转化，未来的研究或许也要考虑如何结合新闻业的特色发展新的隐喻。如同理论可以区分为宏大理论、中层理论和经验概括，隐喻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既有接近宏大理论的“根源隐喻”（root metaphors）^④，也有可以对应中层理论和经验概括的隐喻。因此，斯威德伯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隐喻：范式型隐喻（paradigmatic metaphors）和中层型隐喻（middle-range metaphors）。^⑤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根源隐喻过于宏大，依然要寻找具体的抓手才能用来分析经验现象，而经验概括型的隐喻则是一种描述性工具。比较而言，中层理论型的隐喻对于理论化可能更为实用一些，因为它能更好地发挥定义、类比等作用。而且，创造一个范式意义上的隐喻相对少见，更为普遍的还是中层型隐喻。斯威德伯格针对社会学隐喻提出了两种构造方式：“要么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隐喻，要么利用一个已经存在的隐喻，例如通过改变其含义来增加新的隐喻。”具体来说，一种方式是以根源隐喻为基础尝试发掘新隐喻，另一种方式是在一些经验现象的基础上进行提炼，第三种方式则是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拣选，赋予其社会学含义。比如“沉默的螺旋”和“社会资本”就是后两种方式的代表。^⑥与之类似，在新闻研究里，班茨等人就明确把“工厂模型”当作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隐喻，去理解电视新闻部门的新闻工作是如何完成的。^⑦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和韩纲则把系统思维应用于把关理论中，提出“超级把关人”的隐喻。在由大众媒体、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集团构成的把关系统中，社交媒体集团扮演着超级把关人的角色。^⑧

本文对新闻研究使用隐喻的两种方式进行了概括，呈现了隐喻对于新闻研究理论化的功能和意义，但相对于社会学等对隐喻已经讨论较为充分的学科，这些叙述和分析依然是非常初步的。在新闻研究内部，仍有诸多与隐喻相关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第一，隐喻的作用还需要更

① [美]帕梅拉·舒梅克、[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美]多米尼克·拉萨萨：《如何构建社会科学理论》，乔飞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第180-181页。

② Richard Swedberg, "Theoriz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Classics,"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21, No. 3-4, 2021, pp. 296-306.

③ Brendan T. Lawson, "Re-imagin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Relationship through Colouring and Anchoring," *Journalism*, Vol. 23, No. 8, 2022, pp. 1736-1750.

④ David P. Gilfillan, "Metaphors, Theories, and the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Inquiry: A Reply to Pondy," In Craig C. Pinder, Larry F. Moore (Eds.), *Middle Rang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Springer Dordrecht, 1980, p. 80.

⑤⑥ Richard Swedberg, "Using Metaphors in Sociology: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51, No. 2, 2020, pp. 240-257.

⑦ Charles R. Bantz, Suzanne McCorkle, Roberta C. Baade, "The News Fac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7, No. 1, 1980, pp. 45-68.

⑧ [美]帕梅拉·休梅克、韩纲：《超级把关人：社交媒体时代的把关》，《传播与社会学刊》2020年总第54期，第223-256页。

深入的分析。虽然隐喻的本质与类比有关,但当大量已经完成理论化的概念性隐喻进入新闻研究,原本直观的从A到B的转换已经有所淡化,需要超越比较模型来看待隐喻的功能。第二,新闻研究如何有效地形成隐喻仍有待分析。经典新闻学以对新闻工作的研究为核心,这就导致众多来自新闻业的隐喻成为分析的概念,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形成,学术研究的话题也日趋多元,更需要关注隐喻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流动。第三,隐喻的负面效果也需要有所关注。隐喻固然能启发研究者,但它也有可能将事物简单化或是由于选择了不适用的隐喻而产生消极作用。总而言之,“仅仅有隐喻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假设或理论陈述可以让这个观点更加清晰并经得起考验”^①。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美]帕梅拉·舒梅克、[美]小詹姆斯·坦卡德、[美]多米尼克·拉索萨:《如何构建社会科学理论》,乔飞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第182页。

Shandong Province.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predictive governance”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depends on the choice of “technology for use, bureaucracy for body” strategic behavior. First of all, the behavioral strategy of “technology for use” provides a tool for achieving “predictive governance”,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aking care of society”. Grass-root governments provide a technical basis for collecting potential civil information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and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and coverage of grass-roots society. Secondly, “serving the society” constitutes the value of “predictive governance”. In the specific governance practice,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party building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anded and extended the tentacles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through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bureaucracy as a body”, which has enhanced its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grasp for its efficient mobiliz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to solve the potential civil situation and serve the masses. Behind the realization of “predictive governanc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have demonstrate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basic power, that is, the unity of caring for society and serving society.

Using Metaphors in Journalism Studi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AI Hongyi

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cognitive tool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external world in everyday life, but also a key theorizing tool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ism studies has also created and used a great deal of metaphors, but how the workings of metaphor i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remains less discussed. Journalism studies either use metaphors as a descriptive tool and neglect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or introduces metaphor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theoretically transformed, leaving journalism itself under-viewed. With the rising emphasis on theorizing in journalism studies, researchers need to conscious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metaphors, not only by introducing existing metaphors but also by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of constructing them.

“News People”: Professional Dispersion and Cultural Remolding of Digital News Production

CHANG Jiang, LUO Yaqin

Abstract: The digitization of global journalism has led to a generaliz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actors, and therefore reshaped the professional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news production, the old “occupation-centered” system represented by “journalist” or “news worker” has been declining, and in response to the dispers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news people” has manifested its theoretical and discursive significance as a substitute core concep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news people,” the traditional news production system has been reconstructed, new rules of multi-modality, distribution, and interven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stablished, a new system of ethics with publicity and transparency as the core standards has been explored and built, and a highly networked new ecosystem is formed on the two overlapping dimen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meaning circulation. The goal theorizing the compos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news people is to continuously clarif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journalistic actors in the digital age, expand the humanistic epistemology of journalism theory, and create a professional culture of journalism that equally values knowledge and value.